

凯恩斯就业理论 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

刘涤源 文建东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经公世,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传播到美国,形成美国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并长期支配着美国经济学术界与政策界。凯恩斯就业理论在美国是以哈佛大学为据点、在汉森(A·Hansen)教授的极力促成下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凯恩斯理论逐渐动态化、长期化、政策化并被补充以微观基础分析,从而得到发展与完善。

一、传统与变革:《通论》前的美国经济理论

在美国,《通论》出版以前的经济学界是以传统的自由经营论保守思潮为主导的,尽管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危及到传统经济理论,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自由放任的信念并未发生动摇。以哈佛为例,被誉为美国的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陶西格(F·W·Taussig)的《经济学原理》仍然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主要教材。1934年,有哈佛经济系7位学者参与出版的《复兴规划经济学》对罗斯福“新政”提出了批评。对1929—1933年的大危机,熊彼特(J·A·Schumpeter)的解释是长、中、短三种周期的萧条阶段偶然巧遇到一起所致,并且他还认为萧条完成着必要的经济功能,复苏能自动进行。张伯仑(E·H·Chamberlin)则是萨伊定律的拥护者。

但是,1929—1933年大危机毕竟还是触动了传统理论:或是受大危机的影响,或是由于其它原因,美国经济理论界出现了一些与上述传统观点迥然不同的改革思潮。例如,1932年美国有10所大学与霍普金斯学会曾联名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利用财政金融调节措施应付经济危机;参与者甚至包括一向以保守闻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者。例如,华府两位主要经济官员——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卡斯(M·Eccles)和罗斯福总统经济顾问居里(L·Currie),在财政政策方面得出了类似于《通论》的结论。又例如,库兹涅茨(S·Kuznets)进行了与凯恩斯就业理论相平行的国民收入核算研究。此外,在哈佛大学讲台上,已故的凡勃伦(T·B·Veblen)要求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和斯威齐(P·M·Sweezy)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古典——新古典的主要替代学说也占有一席之地,影响既深且广。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通论》出版之前,凯恩斯已逐渐形成国家干预思潮并试图向美国宣传,如他1931年出席了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1934年拜会过罗斯福总统,但成效不大,罗斯福没能听懂他的宣传鼓动,也不欣赏他的理论,并讥讽他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家。罗斯福的“新政”采纳的是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而不是受了凯恩斯的影响;而且“新政”只不过是一些临时应急措施,绝非现代凯恩斯主义所设计的一整套系统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此外,“新政”也缺乏象凯恩斯主义政策那样深入细致的理

论基础。因此,“新政”与凯恩斯主义政策只是不谋而合而已,绝不能说凯恩斯理论促成了“新政”;相反,倒是“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创建。总之,1929—1933年大危机并没有直接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重大变革,而引起转变的却是后来出版的凯恩斯的《通论》和汉森的大力传播。

自《通论》1936年出版之后,凯恩斯要求国家干预的就业理论就迅速在美国流行与发展。这一过程是在拥护与反对的激烈争论中进行的。根据凯恩斯就业理论在美国的地位的变化,我们可把其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大致分为4个时期:传播时期、发展与鼎盛时期、危机时期和复兴时期。

二、汉森与《通论》:美国的凯恩斯革命

第一时期是《通论》出版到战后初期的10多年,凯恩斯就业理论在这一时期迅速传播到美国。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在英国剑桥出版,随即在大洋彼岸的另一剑桥——美国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引起巨大反响和广泛争论。但在汉森到来哈佛之前,这还只是学术性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汉森到来之后,学术气候全然转变,凯恩斯革命在哈佛悄然漫延、渗透并外溢。在这一时期中,哈佛大学成为凯恩斯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汉森尽管对凯恩斯的《货币论》持反对态度,并且一开始对《通论》相当冷淡,但随后很快便表现出对《通论》的极大热情,倾注全副身心而成为诠释者、传道者和发展者。

1937年,汉森应邀从明尼苏达州大学来到哈佛大学担任新成立的李陶尔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为研究生讲授货币银行学,还举办大受欢迎的财政政策研讨班,自此开始在美国传播凯恩斯理论,成为美国经济理论改革运动的先驱与领袖。汉森为凯恩斯理论的美国化所作贡献表现在下列3个方面:

其一是作为诠释者,他对《通论》作了详尽的解释、补充和订正:“对美国学生和普通人解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时他又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衡量了凯恩斯对于经济学的史无前例的贡献,……,对于凯恩斯的错误、混乱、自相矛盾、不能前后贯穿、言之成理之处以及不负责任的说法,他都予以应有的注意,并给以友好而坚定的批评”。^①他后来所写的《凯恩斯学说指南》成为对凯恩斯理论的权威性诠释。同时他和希克斯(J·Hicks)的解释一起发展成为“希克斯——汉森模型”,即IS—LM模型,该模型成为凯恩斯理论最通行的标准解释。

其二是作为传道者,他积极向年轻的同事和学生宣传凯恩斯学说,培养了一代极有影响的著名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P·Samuelson)、托宾(J·Tobin)、索罗(R·Solow)、海勒(W·W·Heller)和奥肯(A·Okun)等;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中坚并组织了声势浩大、影响深广的新古典综合派。

其三是作为发展者,他推进了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理论方面,他和萨缪尔森提出了加速原理作为对凯恩斯乘数原理的补充,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就是汉森—萨缪尔森模型,也即乘数—加速数模型,这成为很有影响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动态化。政策方面,他和他的学生一道将凯恩斯的政策结论加以推广和完善。实际上,就政策而言,汉森一直很重视经济理论的实用性与政策意义,注重利用公共机构和政策来医治社会弊端。《通论》出版之后,他就以《通论》为基础着手制订详尽、系统的经济政策措施,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宣扬赤字预算、通货膨胀和混合经济等主张,这也可看成是对凯恩斯理

论的政策化。而凯恩斯虽然主张国家干预,重视财政政策,但所提政策过于简单,只是提纲挈领地规定了原则,并未设计具体方案。具体方案在汉森这里才得以初步完成。在政策实践上,汉森又促成了1946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建立和就业法的颁布。在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化方面,汉森的影响和作用尤其突出,“可以说是把罗斯福新政由第一阶段的凡勃伦式改革与管理措施二者的人民党式混合,转变为实行紧凑连贯和有信息依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②而且这也是他对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所作的主要贡献。

总之,在美国传播和应用凯恩斯就业理论上,汉森的作用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以致于萨缪尔森喻之为美国的凯恩斯,而加尔布雷思则称他“仅次于凯恩斯,其功绩是拯救了甚至是保守主义者都一直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③

不过,除汉森而外,其他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些人更关心的是向普通人士宣传凯恩斯理论。他们之中有汉森在哈佛的同事西默尔·哈里斯(S·Harris)和劳埃德·雷诺兹(L·G·Reynolds)。前者在6部专著、数以百计的文章和在各种集会上竭力宣扬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后者也积极宣传凯恩斯,我们在下一阶段还要提到他的作用。他们之中还有汉森最得意的学生萨缪尔森,他在1948年首次把凯恩斯思想融入一部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通俗教科书《经济学》中,此书后来一版、再版而至最近的第14版。一般认为,汉森与哈里斯是在美国传播凯恩斯学说的第一代学者。

与此同时,由于汉森等人的努力,凯恩斯的就业理论逐渐走出学术界,向其它阶层进军。一是企业界受到影响,如战前曾有两名实业家聘请哈佛学者传授凯恩斯学说,而经济开发委员会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向商人们阐述该理论。二是首都华盛顿也因汉森的同事与学生纷纷移入而被波及。实际上,首都华盛顿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讨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领导者之一就是汉森的密友、预算局的吉哈德·柯姆(G·Colm)。他在把凯恩斯主义方案分解为可行的成本数量评估中起了主要作用;国家计划协会则在这一时期成为凯恩斯学术讨论的又一中心,并成为与经济开发委员会并驾齐驱、向广大公众解释凯恩斯思想的另一重要机构。三是政界在凯恩斯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同样受到触动,其结果是1946年颁布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就业法,同时成立了为国家干预经济出谋划策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者给予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以有限的、但又是明确的法律支持,后者则使凯恩斯主义者有了大展身手之地,例如该委员会当时成员之一凯瑟琳(L·Keyserling)就把凯恩斯主义政策扩展为不仅是旨在防止衰退,而且还是为了维持合适的经济扩张的一种手段。

但是,《通论》出版之后,在哈佛与其它各校也出现了各种反凯恩斯革命、怀疑凯恩斯学说的种种力量。这主要是一些以前就较为保守的思潮,熊彼特、陶西格、张伯仑、列昂惕夫(W·Leontief)和哈伯勒(G·Haberler)等人代表着这些力量。1937年11月,哈佛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举办《通论》专题讨论会,在会中,维纳(J·Viner)和罗伯特逊(D·H·Robertson)批评了流动性偏好理论;陶西格指责凯恩斯明显地重视就业先于产量;列昂惕夫站在新古典立场上指出就业与产量等实际变量的决定因素中不应含有货币变量。1941年,哈伯勒在《繁荣与萧条》第三版中增加了后来为人熟知的实际余额效应、即庇古效应,以反对凯恩斯的低于充分就业均衡说。40年代晚期,哈佛大学爆发了一场右翼毕业生反左翼经济系的运动,他们把凯恩斯主义等同于威胁到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社会主义而加以抨击。哈佛学监委员会仅仅因为加尔布雷思同情凯恩斯学说而一度撤消了对他提升为教授的任职。哈佛学监委员会还在右翼毕业生的要求下,对哈佛经济系进行了调查,并指责

该系偏向于凯恩斯,说凯恩斯对该系经济思想产生了有害影响。此外,还有人试图将凯恩斯与马克思拉扯到一起,加以责难。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阻碍力量,凯恩斯理论还是在这十多年里势不可挡地扩散到全美各阶层。附带指出,哈佛大学应是传输凯恩斯学说到美国的主要通道,这就在于,汉森以此为基地培养了一代凯恩斯主义者,而这些凯恩斯主义者毕业后又把凯恩斯学说带到全美各地。

三、凯恩斯时代:新古典综合的鼎盛

自战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凯恩斯就业理论在美国进入其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学术上的和政策上的发展,臻于鼎盛高潮。

就学术上看,美国追随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们忙于修改、完善、扩展、精炼、补充、验证和评估种种经济关系、模型和假说”。^④例如克莱因(L·R·Klein)建立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数理经济学家们建立了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描述经济波动的动态随机模型;货币理论与政策则从战前受忽视状态中走了出来而重新得到重视;国际经济交往被纳入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凯恩斯理论体系发展为IS—LM模型。

在这期间更重要的是,由于汉森培养出的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形成了现代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他们极大地推进了凯恩斯理论,成为美国经济学中的主流。这表现在,在理论上,他们将凯恩斯学说动态化、长期化和加以扩充。沿着这些道路,他们对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作了发展,形成杜森贝利(J·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和莫迪格利艾尼(F·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对投资函数理论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索罗等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货币理论方面的发展是托宾提出了q规则的资产选择理论;梅茨勒(L·Metzler)将凯恩斯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中。此外,凯恩斯《通论》中缺乏的供给分析和微观分析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例如他们提出了“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理论”和“劳动生产率理论”等,萨缪尔森则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与新古典的微观理论结合在一起。

在政策上,他们将凯恩斯理论动态化,提出了系统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凯恩斯针对30年代的大萧条,强调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同时根据流动性陷阱断言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并且他的政策也过于简单。而凯恩斯在美国的追随者们则突破了上述局限性,使凯恩斯主义政策系统化、具体化,他们认识到战后经济形势并非总是萧条,也会出现膨胀,因而在50年代提出了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主张逆经济风向行事,要相机抉择,而不是一味地推行赤字支出。60年代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增长性充分就业政策,发展了凯恩斯的赤字支出政策。同时,根据IS—LM分析,他们也逐渐认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例如莫迪格利艾尼后来曾说“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

同时,从政策实践上看,美国历届政府也很赏识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纷纷任用凯恩斯主义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如海勒曾在60年代前期担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帮助政府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使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影响更具有政策指导意义。艾森豪威尔政府在50年代基本上推行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不过其结果却不太妙,致使这一时期虽无严重的赤字和通货膨胀,但同时经济增长也很缓慢,被指责为“艾森豪威尔停滞”。于是,进入60年代后,肯尼迪政府与约翰逊政府在海勒与托宾等人的帮助下开始推行增长性充分就业政策,放弃了平衡财政的努力,主张即使在经济扩张时期,只要尚未达到潜在产量水平,就得顺经济风向行事,继续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约翰逊在《1965年总统经济报告》中宣称:“我们已认识到,当经济运行尚低于其潜

力时,就过快地努力平衡财政,那是自我毁灭”。^⑥托宾称这一段时期的政策为“新经济学”。

必须指出的是,战后凯恩斯就业理论在美国的发展主要是由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们完成的,但是和哈佛大学本身却无多大关系。这是因为哈佛经济系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学生们毕业后都分散到各著名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缪尔森和索罗,耶鲁大学的托宾等,他们将凯恩斯就业理论带到了各大学讲台。同时杜森贝利和艾克斯坦(O·Eckstein)则继续留校任教。雷诺兹在耶鲁大学又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使该校在战后成为讨论凯恩斯新思潮的一个主要中心。

另一方面,反凯恩斯的思潮在这一时期仍继续存在,如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不过,此时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批评比较温和,因为美国此时尚未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

因此,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政策实践上,美国凯恩斯主义一新古典综合都处于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和鼎盛状态,以致于加尔布雷思称这一时期为“凯恩斯时代”。这一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供给分析,但中心还是总需求分析,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出发点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基本上被看成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义语,以致于萨缪尔森与托宾称这一时期为“宏观经济学的黄金时期”,这当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这一时期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是IS—LM模型;在60年代,凯恩斯的追随者基本上都同意这一模型,认为它提供了总需求分析,因而60年代又被看成是“IS—LM的一致意见时期”。

四、内外交困:凯恩斯理论的危机

6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上的失误越来越大,美国经济被导入前所未有的“滞胀”困境。这一失误也折射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致命弱点:宏观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需求分析忽视供给分析。于是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既在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又从外部招致与日俱增的怀疑、批评与指责,可谓是内外交困,压力重重。面对这双重压力,凯恩斯主义者不得不忙于辩解、争论和补救。从此以后,他们在困境之中挣扎,直至80年代初期。这10多年的艰难时光,正是罗宾逊夫人(Mrs. J·Robinson)所说,她平生所经历的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凯恩斯理论的危机。

我们知道,《通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萧条这样的短期经济问题,而短期内供给是假定不变的,所以凯恩斯强调了需求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供给。《通论》才出版不久,罗宾逊夫人与希克斯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50年代虽然出现一些对生产要素供给的分析,但中心依旧是总需求。60年代后期以来,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由于增长性政策的实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失业人数逐渐增多,最终引发60年代末70年代的“滞胀”,同时出现了国际收支失衡、资源耗竭、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表现出无能为力:既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又不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而且,恰恰是由于凯恩斯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和政策失误导致了这场灾难。于是凯恩斯就业理论失灵。罗宾逊夫人对此评论道,这是她一生中经历过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自由放任的古典、新古典学说在30年代的破产,“第一次危机是由那种不能解释就业水平的理论而产生的;第二次危机则是由这种不能解释就业内容的理论而产生的”。^⑦第一次危机导致凯恩斯革命——对古典、新古典主义的革命,第二次危机则导致古典、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并引发一场遍及美国经济学界的围绕凯恩斯传统的

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新剑桥学派和莱荣霍夫德(A·Leijonhufvud)等人从他们所理解的凯恩斯传统出发,新制度学派从左的方面,新自由主义从右的方面,都对新古典综合进行了批评。新剑桥学派的罗宾逊夫人以凯恩斯左派的面貌出现,指责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背叛了凯恩斯传统,错误地把凯恩斯所否定了的新古典理论综合到凯恩斯体系之中。莱氏则认为凯恩斯理论本身并无缺陷,不曾忽视供给分析与货币政策,问题出在凯恩斯在美国的追随者们身上,并把他们的理论斥责为“庸俗的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则对凯恩斯本人及其追随者的理论都进行了批评,他们主张回到古典与新古典的传统中去,认为资本主义是能够自动调节而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认为主动的政策会因为适应性预期而只有短期的暂时的效果,同时依据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最重要,因此他们主张只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也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⑦他们从货币主义中发展而来,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更激进、更强烈。他们明确指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具有重大缺陷:缺乏微观基础。在他们看来,这个微观基础应该是市场出清、理性行为(如理性预期)和完全市场(如工资与价格的充分灵活性、完全竞争)。有趣的是,此时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又在费尔德斯坦的领导下成为反凯恩斯的主要据点之一。

如果说货币主义与供给学派的批评焦点还只是放在政策方面,那么理性预期学派则同时注重了理论与政策两方面。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确实缺乏微观基础,尽管萨缪尔森等人把新古典的微观理论放到了凯恩斯主义体系之中,但宏微观只是放在了一起,是一种机械的组合,缺乏有机联系。而到理性预期学派,宏微观才开始有机地结合,从而出现一个与凯恩斯体系匹敌的宏观理论。因此,对凯恩斯主义而言,理性预期学派的批评才是致命的一击,击中了其要害,促使其深深地陷入危机与困境。

在论战中,新古典综合派竭力维护凯恩斯主义的正统地位。他们解释道,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失效,而只是相对于复杂的经济形势而言,它具有局限性:单单依靠总需求管理确实不能同时实现多种经济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凯恩斯主义也需要发展。

针对批评,新古典综合派也进行了反驳。例如,对货币主义,他们认为自己从未忽略过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一向主张财政与货币政策并重。例如,对理性预期学派,他们认为不存在理性预期和价格的充分灵活性,因而稳定政策依然有效而且必要。例如,对于供给学派,他们回答道:“我们的‘新古典综合’强调的是可以通过有利于资本积累的货币、财政措施来实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目标”。^⑧例如,针对莱氏的批评,格罗斯曼反驳说:“在我看来,凯恩斯的思想既在实质上和他的通俗化者的思想相同,又有着类似的缺陷”。^⑨又例如,对新剑桥学派,他们更是与之激烈辩论,这就是所谓“两个剑桥”之争。

这一论战的结果是,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补救工作。在理论上,他们逐渐加强了微观供给分析,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用供给的异常变动解释滞胀,提出新福利经济学以解决收入分配与资源重新配置问题,在政策上,他们也注重多种措施的配合使用,如松紧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宏观政策的微观化,以微观收入和人力等政策补充宏观财政货币政策。此外,新古典综合派还注重吸收其它各派有用的观点,例如他们接受了货币主义的自然失业率理论、负所得税方案等。

另一方面,来自凯恩斯主义体系内部的批评又导致一般非均衡理论的兴起。莱氏、帕廷

金 (D·Partinkin)、格罗斯曼和巴罗 (R·Barro) 等人或是批评凯恩斯本人的理论, 或是指责IS—LM模型所解释的凯恩斯理论, 认为凯恩斯理论本来是动态非均衡理论, 但他本人却只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及其造成的失业这种特殊非均衡情况, IS—LM模型更是把凯恩斯理论变成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特例。于是这些经济学家开始走出凯恩斯的特殊非均衡分析, 进一步分析各种非均衡状态下产量和就业量的决定, 从而把凯恩斯的理论推广为一般非均衡分析。可以说, 该理论是凯恩斯体系在70年代最富有成果的发展, 因而这一时期又被叫做“非均衡分析时代”。

70年代后期以来, 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不仅仅在学术 (理论和政策) 上受到更多、更猛烈的攻击, 而且在政策实践上和政府中也失去了往昔的信任、荣耀与辉煌。如里根政府执政后直到布什政府都推行了以供给学派政策为主、同时结合货币主义措施的“经济复兴计划”, 致使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强而有力大有压倒新古典综合之势。

五、新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的复兴?

不过, 物极必反, 80年代中期以来, 凯恩斯主义又显露出种种复兴的迹象来。

首先, 经济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凯恩斯主义复兴的方向变化。正如本杰明·弗里德曼 (B·Friedman) 所指出的,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实践中并未取得突出效果, 远远低于各阶层的厚望。他进一步分析了他们的失误: 如理性预期学派根据自然率假说认为通货膨胀无害, 而事实是, 当美国通胀率由1980年的10%降到几年后的3%时, 产量却损失很大, 且总需求下降甚多。如货币主义对货币供给目标的注重也是短命的, 1982年后, 美国经济中一方面是最快的货币增长, 另一方面反而出现最剧烈的通货紧缩。如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会刺激储蓄, 而实际上在80年代的减税过程中, 美国的储蓄率却是下降的。此外我们还知道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极低: 1989年为2.5%, 1990年0.8%, 1991年-1.2%, 1992年估计也只2%左右。这就使得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重新得到重视。他指出: “广义地说, 把下述要素——总需求的中心作用、粘性价格与工资、变动缓慢的均衡过程、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重要效果, 以及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总体经济观, 对于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来说, 看起来仍然和以前一样贴切。我相信, 这就是我们正在干的事情”。^⑩

其次, 由于经济陷入困境, 美国民众思变心切, 强烈要求改变共和党政府12年中以自由放任为基点的政策。这一改革思潮终于导致白宫易主: 民主党克林顿走马上任, 美国政府“改朝换代”。克林顿尚未就职, 就早已勾勒出未来的经济施政纲领: 扩大公共开支, 刺激私人投资, 增加富人税收, 减少中下层税收, 目的则是减少预算赤字, 促进经济增长, 增加就业机会。我们看到, 这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何其相似。

最后, 更重要的是, 凯恩斯阵营的经济学家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严格的微观基础。他们认为, 微观经济中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 如工资与价格确定过程中的相对价格刚性, 导致了宏观经济中的价格粘型, 由此而造成名义变量 (如货币供给) 得以影响实际变量 (如产量和就业) 而产生经济波动。据此他们指出, 自由市场是低效的, 政府有可能改善资源配置; 但他们同时也承认, 这种改善只是理论上可行, 实践中会遇到许多困难。这就是近来颇有影响的新凯恩斯主义。在这里, 微观个人行为终于和宏观产量、就业模型紧密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凯恩斯主义有了一个与新古典宏观理论分庭抗礼的崭新理论。因此, 与其说理性预期的批评对凯恩斯主义是致命的一击, 不如更准确地说, 它也是一种有益的推动, 促使其得以发展。如果说上一阶段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根源在于微观基础的缺乏, 那

么这一阶段微观基础的加强则促成了它的复兴。正是因为这种新理论的出现,80年代又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时代。

综上所述,我们注意到,70、8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界形势复杂而多变,它不再是凯恩斯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出现了各派崛起、众说纷纭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与其它各派之间围绕着凯恩斯就业理论展开激烈论战。论战中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它仍然雄居霸主宝座,继续处于正统地位,而且最近又表现出复兴趋势。

注释:

①S·哈里斯:《阿尔文·汉森》,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转引自《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当代外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131页。

②萨缪尔森:《开端》,载《挑战》,1988年,7—8月,第23页。

③⑥加尔布雷思:《凯恩斯是怎样来到美国的?》,载《论凯恩斯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页。

④⑧托宾:《凯恩斯革命忆旧》,载《挑战》,1988年,7—8月,第40、41页。

⑥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第6页。

⑦理性预期的新古典不同于马歇尔等人的新古典,在英文里前者为New classical,后者为Neo-classical。之所以都称新古典,是因为理论上有继承性。

⑨格罗斯曼:《凯恩斯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吗?》,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2年,3月,第26页。

⑩本杰明·弗里德曼:《演进处于优势》,载《挑战》,1988年,7—8月,第52页。

(责任编辑 王雪松)

~~~~~

(上接15页)度。要使信息灵敏准确,必须系统地掌握微观经济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市场运行变量,及时反馈,准确处理。这样,就必须有相应的信息系统。这一系统,既要服务于宏观调控主体,又要服务于市场运行主体。

其八,政策要贯通。为保持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序运行,相关的政策必须前后一致,左右相辅,而不能前后相抵,左右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经济政策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但是应当保持前后的连续性和

左右的贯通性,如果前后政策矛盾,即使体制适宜,也无法保证经济运行的高效、有序。

上述改革,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些条件的实现,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形成。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难以建立,而且经济运行的冷冷热热、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松松紧紧都难以避免。

(责任编辑 王雪松)